

时空社会学的基本问题

——迈向当代中国社会的研 究路径

◎ 郑 震

内容提要 时空转向已经成为当代西方社会学思想变革的一个标志性特征,然而这一转向依然困扰于主客体二元论和时空二元论的桎梏,并且没有能够明确区分作为分支学科的时空社会学和重建整个社会学话语的时空本体论维度,也没有能够对时空本体论维度进行明晰的概念化建构。对于这些问题,以反二元论的社会历史实践为核心,从分析的角度将实践的时间本体论维度理解为实践的可能性,将实践的空间本体论维度理解为实践的关系性,并且指出实践的可能性和关系性不过是赋予同一整体的不同的名称,从而建立起一种时空本体论的社会学思路。

关键词 时空社会学 社会时空 二元论

(中图分类号)C9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5)07-0116-09

DOI:10.15895/j.cnki.rwzz.2015.07.016

在社会科学的历史上,实证主义的长期统治极大地影响了社会科学的主导形态,其中一个极其基本的方面就是宣称“社会科学关心的就是如何阐述具有普遍性,或至少是高度一般性的法则”。^①以至于人为地将包括社会学在内的所谓社会科学与历史学和地理学这样的被视为是专门研究时空问题的学科划清界限。这一做法极大地压制了社会学对时空问题的思考,以至于即便社会学家们偶尔谈及时空问题,也大多只是将它们视为是一些物理学的参数,仿佛时间就是流逝着的分分秒秒(即便是源自19世纪的历史主义思潮在实证主义的支配下也没有能够推动对时间进行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学研究,相反它更多地只是催生了对普遍历史规律的狂热),空间就是可以测量的物理距离或者说物理环境。不过在此种实证主义占据支配地位的形势下,并非没有社会学家进行过一些别样的思考,如涂尔干、齐美尔和戈夫曼等人的研究中已经暗示了某种不同于物理环境的社会空间的可能性,而米德的过

程社会学则向人们显示了时间维度的本体论意义,如此等等。但是这些研究要么没有得到作者本人的充分重视从而只是一些局部和片断的考虑(如涂尔干和齐美尔),要么被作者本人的更为显著的消极时空观念所压制(如涂尔干和齐美尔),要么因为作者自身研究领域的局限而未能形成对社会学具有广泛意义的概念工具(如戈夫曼),或者是因为作者本人在主流社会学的压制下处于社会学研究的边缘而无法使自己的观念产生足够的影响力(如齐美尔、米德和戈夫曼)。只是到了20世纪的中后期,伴随着实证主义社会学所编织的绝对主义幻觉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危机的挑战下逐渐破灭;伴随着以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等新科学为基础的科学哲学的兴起对实证主义科学哲学的致命挑战;伴随着来自哲学等其他领域的各种相对主义思潮对社会科学的冲击;以及资本主义世界的新发展所带来的多元消费

^① [英]吉登斯《社会的构成》,李康、李猛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502页。



文化的兴起、城市化的急剧扩张、资本的全球化扩张及其相伴随的日益尖锐的文明碰撞和文化冲突等问题,原本倍受主流社会学压制的时空问题逐渐凸显到了社会学思考的前台。由此,关于时空问题的讨论日益成为社会学研究的核心话题,与之相关的各种基本问题也就构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不过本文并不打算就这里所引出的问题进行一项详尽的思想史的研讨,我们所关心的是如何在一种当代中国研究的语境中塑造这些问题的基本形态和研究思路,在批判和超越西方研究之局限性的同时,为中国的时空社会学研究提供一些启发性思考。

一、时空研究对于社会学的意义

将时间和空间维度引入社会学的研究究竟意味着什么?是在社会学的领域中开辟出一些新的研究对象,还是对社会学本身进行某种根本的改造?这并不是一个可以简单回答的问题。放眼西方社会学在20世纪中后期的变革,我们不难发现两种思路可以说是并行不悖的,它们共同参与塑造了当代西方社会学的研究视角。一方面,诸如监狱、学校和工厂之中的时间表以及各种场所或区域的空间安排、空间生产等问题,成为人们所广泛研究的对象。社会学家开始广泛地关注于时间的计时和场所的社会生产与分化等因素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与意义,这些研究显然将时间和空间开辟成社会学的两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尽管人们并没有认为两个领域之间是毫不相干的,甚至明确的指出它们之间存在着重要的联系——如机构中的时间表总是与空间的安排和区域的划分密切联系在一起,^①但是时空的二元论始终是西方社会学思想的基本预设,关于这一问题我们将在后文讨论)。另一方面,时空的意义又远远超出了某些具体的时空现象所构建出的所谓的具体领域(这些领域仿佛与政治、经济、教育等等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的社会领域处于并列或交织的状态),以至于仅仅局限于具有明确物理存在的社会场所来谈论空间,或局限于钟表计时对社会活动及其节奏的规划来谈论时间显然都是远远不够的。诸如列斐伏尔、埃利亚斯、福柯、布迪厄、布希亚、吉登斯等等这些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的代表人物都无一例外地在他们的理论中引入了某种本体论

的时空维度(我们此前所提到的那些围绕一些物理参数所形成的具体的时空现象与那些发生于物理时空之中的现象一样都要奠基于此种本体论的时空维度,后者的存在绝不仅仅是为社会活动提供一些不可或缺的物理的限制或条件并以此来获得其自身的社会历史意义),这使得我们可以谈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学的时空转向,它是社会学必须加以面对的全方位的自我认同的问题。

尽管像列斐伏尔和福柯这样的作者往往被视为是西方社会学理论之空间转向的代表人物,但是在他们的空间本体论思路中总还是存在着时间性所揭示的人之存在的历史性意味(也就是时间的本体论意义),只不过他们对现代西方社会的研究受到一种空间主导性思路的支配罢了(我们可以将这种思路视为是对于历史主义在西方社会学中的长期统治的一种矫枉过正,^②它当然也受到了20世纪50~60年代在西方世界所兴起的以大规模城市化和资本的全球化扩张为代表的所谓的空间生产的刺激,就如同19世纪资本主义世界的迅速变革极大地激发了突出时间维度的历史主义的想象力一样^③)。以福柯为例,尽管福柯的关系主义的权力本体论总是以某种空间的样式而到场,权力不可能不以某种空间性的方式而存在,权力的技术不可能不是某种空间性的技术,但它同时也是某种时间性的技术,权力关系不可能外在于时间就如同它不可能外在于空间一样。任何权力及其合理性都是历史性的,^④所不同的是,时间的本体论意义是在空间的主导性框架中得到阐发的。也正是因此,当福柯着手描绘其心目中的现代社会图景的时候,他想到的首先是一种空间的隐喻,这就是边沁所构想的全景式监狱的模型,他写道“全景展示的方案,无需作为此种形式而消

^① 福柯与吉登斯的研究可以说在这方面提供了非常好的说明,可以参阅 Foucault, M.,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Inc., 1977, pp. 135 ~ 169; [英]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赵力涛译,三联书店,1998年,第214~222页。

^② 郑震《空间:一个社会学的概念》,《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5期。

^③ 这里所谓的“空间生产”和“历史变革”其实都并非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仅仅突出了时间和空间的某一方面。

^④ [法]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64页。



失或失去它的任何特性,注定了要延伸到整个社会;它的天职就是成为一种一般化的功能。”^①事实上,我们只能通过福柯的具体分析才能够感受到这一论断中所隐含着的时间维度。

不难看出,将时空加以本体论化的企图带有明显的相对主义思潮的烙印(正是以绝对主义立场为指导的实证主义社会学在20世纪6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现实危机的挑战下陷入窘境,以及20世纪60~70年代多样化的消费文化成为一种主导的社会现象等因素,为相对主义对西方社会学的大举入侵提供了重要的契机),以至于人们不再将人的存在与某种不变的永恒预设联系在一起,不再热衷于寻找那些超时空的存在的规律性,相反存在本身固有的就具有时空性的本体论内涵。换句话说,我们只能从时空出发来理解人的社会存在,这不是将某种外部的时空标准引入到对人的解释之中,而是意识到人的存在本身就是时空性的。这一社会学的时空本体论转向才是时空问题在当代社会学中的根本意义所在,它绝不只是满足于谈论一些计时和场所的话题,相反时间和空间的维度已经转变为社会学理论思考的基本预设。也就是说当代社会学理论正是从时空的预设出发来建构其对于人类社会的理解和解释,我们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将这些时空的预设从当代西方社会学的理论中抽离掉,那么恐怕就再也剩不下什么了^②(这表明至少在我们看来时空维度对于当代西方社会学而言绝不仅仅是某种抽象的参数,不过我们在后文将指出,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在这一问题上显然存在着含混和不足之处)。就此我们可以给出如下的论断:时空问题之进入到当代西方社会学研究的核心这一事件所反映的是一种社会学认识论范式的革命性转向,它将原本只是存在于西方社会学研究之边缘的相对主义的可能性发展成一种支配性的理论战略,这可以用巴什拉和福柯等人所谓的认识论的断裂来加以形容。^③

二、什么是社会时间与空间

当我们理解了人们可以从两个分析的层次入手来思考社会学的时空问题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关于时间和空间究竟是什么的问题。事实上在上一节的讨论中已经提及了一种最合乎于常识的对时空的

理解,并且还暗示了另一种显然并不那么为流俗之见所理解的时空观念。前者便是以所谓的钟表时间(物理时间)和物理环境为代表的常识的时空观,它们似乎理所当然的扮演着社会学所思考的时间和空间的原型角色,以至于人们常常以为它们就是时空本身。然而正如埃利亚斯所指出的“记时手段的发展表明,物理学和自然主义的时间概念的此种优势地位是一个相对晚近的现象。”^④那种以时钟、日历和时间表为其代表的物理时间模型不过是伴随着现代物理科学的发展而形成的一种晚近的社会历史现象,它仅仅是一种以科学主义的方式加以量化的时间观,只是人类所建构的众多时间模型中的一种模型而已。与之相同的是,空间的物理模型也并非唯一。更何况将社会生活中的物理环境(即常识意义上的社会场所)视为是一种单纯意义上的物理存在的做法也已经在当代社会学理论的空间转向中被加以唾弃,探究不同于其物理维度的社会维度的思路成为突破传统空间思维的一个重要方面(至少那些物理维度只有在一种社会性的意义上才能够被新的理论视角所接受,我们前文所提及的那些当代理论家们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来思考社会场所的)。

然而正如我们的研究所表明的,探究钟表计时和物理场所的社会意义对于时空社会学或者说社会学本身而言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它们甚至可能错误地使人们的想象力仅仅局限于时空的物理模型。由此可见,对于当代时空社会学研究而言,重要的是探究那种不为流俗的时空观念所熟悉的时空概念,后者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也是问题的难点所在。尽管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对于当代的理论家们而言,他们对时空的本体论化似乎并没有什么分歧,但是

^① Foucault, M.,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Inc., 1977, p. 207.

^② 我们并不否认即便像福柯和布希亚这样的当代激进作者的思想中依然存在着某些形而上学的残余,但是这些残余显然并不属于这里所谈论的意义上的当代思想。

^③ Bachelard, G., *The New Scientific Spirit*, Boston: Beacon Press, 1984; Foucault, M., *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0, p. 50; Foucault, M.,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2, p. 8, 9.

^④ Elias, N., *Time: An Essay*, Oxford, Cambridge: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2, p. 3.



他们却很少系统地阐明这种本体论的时空究竟意味着什么,更重要的是他们几乎从不在分析上明确地区分我们所提到的两种时空维度,而是任由它们以其天然的一体性融合在文本之中,这十分易于导致各种混乱和误解(如将社会学的时空转向仅仅理解成转而关注于物理时空的社会意义)。换句话说,在他们的理论中时空的本体论维度更多地只是作为一种不可或缺的预设或前提来发挥隐喻的作用,一切社会现象都在一种时空的隐喻中被理解和解释,即便是那些时间表和区域场所也不例外。除此之外,至于这里的贯穿一切的本体论的时空维度究竟意味着什么则往往语焉不详。例如,尽管列斐伏尔围绕着空间实践、空间表象和表现的空间这三个核心概念给出了也许是最为系统和专门性的空间理论框架,但是他所描绘的现代资本主义的抽象空间最多也只是一个符号统治的空间,这一空间的本体论地位只是因为它的生产再生产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并且与生产力密切联系在一起。^①虽然对符号维度的提及表明了列斐伏尔的空间研究并非只是在探讨一种物理空间,但是列斐伏尔的兴趣显然集中在符号化的物理空间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而这一抽象空间的社会本体论地位也正是由此而获得。这意味着我们无法在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中找到一种可以用于理解更广泛意义上的社会历史活动的空间本体论思路,毕竟他所谓的空间实践并不包含所有的社会实践,他所谓的空间生产也仅仅是指现代资本主义的符号化的物理空间的生产。这一思路和物理空间依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甚至在列斐伏尔看来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兴起的所谓的新资本主义社会密切联系在一起。这也就难怪列斐伏尔会将革命的希望寄托在时间的身上(且不论这里所包含的时空二元论谬误),以至于冲淡了建立一种更加广泛的社会空间本体论思路的意义。与列斐伏尔相比,福柯的空间研究则更缺少正面和系统的描述和阐发,^②其空间的本体论维度隐含于权力关系的本体论建构之中,此种维度和具体场所之中的空间安排之间的奠基性的关系并没有得到系统的阐明。而在时间问题上,人们更多地还是将时间理解成一种不可或缺的隐喻式前提,它意味着人之社会存在的过程性或历史性,但是至于这一过程性应当被如何在本体

论上加以概念化的问题则往往语焉不详。甚至专门写过一部以时间为标题的著作的埃利亚斯,也只是在他的这部著作中讨论了量化时间的问题,^③因此他所关注的不过是流俗的时间概念,从而并不能够为我们提供有关时间本体论的直接概念化。

不过即便如此,现有的研究已经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些启发性的见解,例如,列斐伏尔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空间视为一个符号统治的抽象空间;福柯则将社会空间视为实在和观念的混合物;^④布迪厄将其所谓的场或社会空间视为一个不同社会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的网络;^⑤而吉登斯则写道“场所指互动情境,它包括情境的物理维度及其‘结构’,它是互动体系与社会关系的聚合所。”^⑥从中不难看出,当代的空间理论家们无一例外地主张社会空间不仅是一种物理的存在,它更是一种基于物理存在的社会性构成,无论这一构成被如何具体的解读,总之它不外乎是一种观念性的建构。只不过列斐伏尔将这一建构视为由抽象空间的恐怖主义话语所主导的符号化,福柯则将其视为体现了一种客观的权力关系,而布迪厄则援引马克思意义上的客观关系来诠释这一社会性的特征,至于吉登斯则将其视为一种结构性的社会关系集合。由此可见,空间的观念性存在总是具有一种关系的特征(列斐伏尔所谈论的符号的意义正是来自于一个意义的关系网络,这一思想可以追溯到索绪尔的符号学理论,并且被之后的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思潮加以系统的发挥^⑦)。然而这种关系性在不同作者的笔下却大多或多或少地

① Lefebvre, H.,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Malden & Oxford & Carlton: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1991, p. 85; Soja, E. W., *Postmodern Geographies: The Reassertion of Space in Critical Social Theory*, Verso, 1989, p. 91.

② 郑震《空间:一个社会学的概念》,《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5期。

③ Elias, N., *Time: An Essay*, Oxford, Cambridge: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2.

④ Foucault, M.,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Inc., 1997, p. 148.

⑤ [法]布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133页。

⑥ [英]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赵力涛译,三联书店,1998年,第13页。

⑦ Giddens, A., *Social Theory and Modern Sociolog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81-84.



被一种类似的偏见所扭曲,这就是客体主义的倾向。^①它体现了笛卡尔主义的二元论偏见在西方思想中的根深蒂固,即便是那些试图克服主客体二元论的企图也不同程度的遭遇了失败(如列斐伏尔、埃利亚斯、布迪厄、吉登斯等人的努力)。我们并不否认关系主义所具有的启发性意义,但是并不赞同一种带有客体主义倾向的关系性概念,也不认为此种空间的关系性仅仅局限于所谓的空间实践(如在列斐伏尔那里)、或仅仅存在于客观的社会位置之间(如在布迪厄那里)、或实质上不过是一种霸权式的权力关系(如在福柯那里),如此等等。在我们看来,一个观念性空间正因为其所包含的复杂的意义关联而成其为一个社会空间(如果以一种比附物理空间的方式,我们也可以谈论这一空间中的距离,但这是一种无法用物理标准加以测量的社会距离^②),意义正是来自于关系的建构,而关系本身也只能是一种意义的关系(关系不是实体,任何关系都不可能独立于相关的各方而存在,它只是使各方联系在一起的意义而已),意义与关系是共属一体的,它们不过是同一现象的不同的名称,并始终内在于人类行动者的实践之中。毕竟我们与他人、事物,乃至与社会群体的关系只能在彼此接触的具体的实践活动中才可能成形,我们无法想象一种无关系的实践(即便是内心的独白也不可能独立于社会性的关系,如对语言的使用),更无法想象一种无实践的社会关系。就此,我们将社会空间理解为是一种实践性的关系状态,它是不同个体之间、个体和事物之间、群体和群体之间的一切社会性关系的总体,它也正是因为这些关系的社会历史的多样化从而分化为多样化的社会空间。此种关系状态的实践性特征表明,它既没有预设一个绝对的主体也没有预设一种客观性的存在,尽管从分析的角度来说(分析本身就是一种人为的划分),如果没有主体的能动性它将无所行动,没有超个人的社会历史性它也将无所关联。关系性的假设已经超越了孤独个体的存在,只不过关系也只能是由一个个并非孤独的能动的个体相互组建起来的,而我与事物之间的关系总已经间接地设定了他人的在场。

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在当代西方社会学中,社会本体论上的时间问题往往是以一种历史的隐喻而

到场的,此时历史概念成为一个主导的话题。这里突出的是历史建构的本体论地位的问题。与实证主义者热衷于寻找普遍的历史规律不同,当代的理论家们主张以一种非决定论的思路来颠覆实证主义的决定论逻辑,从而主张历史并不是确定的必然过程,而是充满了不确定性的关系事件的过程。也正是因此,尽管列斐伏尔对其心目中的革命理想怀揣着必然实现的乌托邦信心(之所以是乌托邦的就在于它并非基于某种经验的推论,这显示了一种形而上学式的残余),但是他同时也指出,这个必然到来的革命也只能是以主体无法确知的可能性(Possibilities)方式出现(必然的偶然性或偶然的必然性),它无法基于对过去的了解来加以推论。^③它不是强加于人的绝对的客体,也不是绝对主体的自由意志的外化(这种模棱两可的状态体现了列斐伏尔突破主客体二元论的一种努力)。对福柯而言,相对于人类行动者具有一种历史的先验性的权力-知识显然不是形而上学的绝对,权力-知识的关系体总是在历史的过程中发展变化,^④这里并没有什么社会学意义上的必然的规律可循。而人文科学所设想的那种不变的人的形象其实质不过是一种自我欺骗的幻觉。^⑤与福柯同样热衷于历史研究的埃利亚斯尽管在历史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的问题上与福柯争锋相对,但是他同样反对将历史视为是绝对必然的宿命。即便他受到启蒙的理性主义的影响而主张西方世界乃至更广泛的人类世界在文明进程的结构和趋势上

① 这里当然存在着程度上的差异,与后结构主义者福柯不同的是,列斐伏尔和布迪厄虽然主张社会空间相对于主体的逻辑优先性,但是他们都没有彻底否定主体的能动性。而尽管吉登斯试图以行动和结构的二重性立场来克服主客体二元论的桎梏,但是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他的时间和空间概念都是结构性的(Lash, S. & Urry, J., *Economies of Signs and Space*,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1994, p. 230)。

② 郑震《作为存在的身体》,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4页。

③ Lefebvre, H.,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Vol. 2): Foundations for a Sociology of the Everyday*, London & New York: Verso, 2002, pp. 111 ~ 113, 137 ~ 138.

④ Foucault, M., "Penal Theories and Institutions," in Michel Foucault (Vol. 1): *Ethics*. P. Rabinow ed.,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7, pp. 17 ~ 18.

⑤ Foucault, M., *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0, p. 370, 371.



具有某种普遍的相似性^①但是他既反对将文明视为一个迈向某种形而上学目的的不可逆的机械过程,同时也明确地指出,所谓的社会的规律与自然的规律都是伪装为事实的理想。^②我们无需进一步将诸如布迪厄、布希亚和吉登斯等人的历史观一一加以陈述,他们与此前的作者们共同分享了一种非决定论式的历史观,只不过每一个作者的具体倾向存在着激进或保守的程度差异。但正如已经指出的,时间之社会本体论的意义并没有被明确地以概念化的方式加以厘清和阐发,只不过它始终以某种方式隐含在每一位作者的叙述之中。

如果说历史不再呈现为一种机械的必然过程,那么也许最为合适的理解就是,并不存在可以精确预言未来的客观可能性,社会现实不过是过去所隐含的诸多可能性在当前的特定机遇中彼此碰撞所激发出的具有某种或然性的现实化。必须指出的是,此种或然性并不等同于所谓的统计的规律性(麦金泰尔指出“我们称社会科学的普遍概括是或然性的,丝毫没有说明它们的地位,因为它们不同于统计力学的普遍概括,正如它们不同于牛顿力学和气体定律方程式那类普遍概括一样。”^③)它同样也并非列斐伏尔所谓的乌托邦的可能性,更不是什么彻底混乱的偶然性。相反我们将称之为“可能性”的此种本体论的时间维度总是呈现为特定社会历史情境中的或然性,换句话说它不仅无法以满足某些决定性条件的方式被决定论式地加以推论,而且情境的特殊性和无限多样性也使得任何寻找普遍的统计规律性的企图化为泡影。但是此种可能性的实现总能够被赋予一种事后的合理解释。也就是说尽管它具有某种无法事先掌控的偶然性,但它的产生总是具有某些社会历史性的缘由,只不过这种解释并不支持任何意义上的普遍主义的推论。

与空间问题十分类似的是,时间问题也没有能够逃脱主客体二元论的阴影。在历史和主体之间往往是前者扮演了至少是逻辑上的支配性角色。尽管像埃利亚斯、列斐伏尔、布迪厄之类的反二元论者与福柯、布希亚这样的后结构主义者在对待主体的态度上有着明显的分歧,但是他们并没有因此而彻底抛弃客体主义的价值倾向,相比较而言他们倒是无一例外地表现出对客体主义历史观的某种同情。这一点充分

体现了他们在方法论上的逻辑连贯性。因此,作为可能性的时间维度也同样需要证明自身的非二元论的立场,对我们来说这就是实践的可能性。可能性之内在于实践的意义就在于,从分析上来说,它一方面只有通过主体的能动性发挥才可能在实践中现实化,因此并不存在什么超个人的自动机制将个体作为傀儡加以摆弄;另一方面这一现实化并不源自于一个孤独自我的外化,而是在不同可能性的碰撞中的社会历史性的选择(当然这并不一定是一种有意识的选择),它总是直接或间接地与他人的存在联系在一起。

三、反对时空二元论

以上的研究将时间与空间加以分别论述,这不仅是因为我们所谈论的那些作者正是将时间和空间加以分别对待,仿佛时间和空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现实存在,更是出于分析上的需要,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混乱。前一种情况所包含的时空二元论的立场在西方思想史中有着悠久的历史,它很大程度上受到量化时空观的误导。当人们用不同的量化标准来记录所谓的时间和空间的时候,便貌似理所当然地承认了时空的二元状态。人们并没有意识到此种区分并非因为时空之间固有的差别,而是人们在观察和测量时空整体时所采用的量化手段的局限性人为肢解了时空的整体性,这同时又契合了常识对时空的误解。^④可以说量化的时空观尽管在现代社会中获

^① Elias, N., *The Civilizing Process: Sociogenetic and Psychogenetic Investigations*,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2000, p. 380, 381, 389, 397, 433, 437, 438.

^② Elias, N., *Essay I: O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and the Sciences (The Collected Works of Norbert Elias, Volume 14)*, R. Kilminster & S. Mennell (eds.), Dublin: University College Dublin Press, 2009, p. 75.

^③ [美]麦金泰尔《德性之后》,龚群、戴扬毅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115~116页。

^④ 量化的时空观所对应的自然或物理时空的二元状态不过是一种经验的错觉,正是这种错觉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时空观。物理现实本身并不包含相互区分的时间和空间,它们不过是人们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赋予某些经验表象的名称而已。事物之间的距离被冠以空间之名,而事物的变化则被冠以时间之名。殊不知人们看到的不过是相距的事物却看不到距离本身,人们看到的不过是变化的事物却看不到变化本身。两种情况中只有事物的存在,而距离和变化不过是为了说明我们对事物的经验表象所起的不同名称而已(只不过人们常常将表象误以为是事情本身)。



得了日益精密的特征,但是其实质依然不能摆脱日常生活的流俗时空观这一原初的面貌。

在以上提及的那些作者笔下,时空的二元状态往往构成了论述的基本预设,以至于人们几乎不假思索地着手去分别研究时间和空间,并且最多也只是回过头来谈一谈空间与时间这两个不同现象之间的某种不可分割的重要联系。这也就难怪在西方社会学的历史上有所谓的在先的历史主义的统治和后来的空间转向了,人们就如同习惯于在主体和客体之间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一样,也热衷于在时间和空间之间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这倒不是要用一方彻底取消另一方,而是往往强调某一方的支配地位,从而将另一方视为是从属或派生的现象。于是那些深受历史主义传统影响的作者便将目光投向了历史的变迁,而空间只不过是一些或隐或现的物理环境罢了(它们充其量只能是一些背景性的物质条件而已),空间即便偶尔被赋予一些不同的关注,也只不过是暧昧不清或无关大局的角色(这类作者包括马克思、韦伯、涂尔干、齐美尔等早期的开拓者,而之后统治了西方社会学的实证主义和结构功能主义的联合体则更是将空间抛在了脑后,尽管他们对历史变迁的关注也大多是徒有其名而已);^①而之后兴起的空间转向的理论家们则集体倒向了空间主导的论调,仿佛时间顿时变成了即便不可或缺但也只是次要的角色,卡斯特写道“不同于大部分古典社会理论时间支配了空间的假定,我提出的假设是,在网络社会里,是空间组织了时间。”^②一时间似乎现代社会的现实表明空间主导的时代已然到来(空间转向的代表人物列斐伏尔和福柯都持有类似的观点),^③像海德格尔那样撰写《存在与时间》的确有些不合时宜了,现在的首要议题是“存在与空间”;这出戏剧当然还有其另外一幕也同样不可忽视,那就是人们又总是或多或少地主张在时间和空间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例如,埃利亚斯认为,空间中的位置关系是由不动和不变的标准来加以确定的,而时间中的位置关系则是由运动和变化的标准来加以确定的。^④但是因为事实总是在运动和变化之中,因此空间的位置关系就只能是一种对事实的抽象,而时间的位置关系则无需此种抽象。^⑤因此“任何‘空间’中的变化都是‘时间’中的变化;任何‘时间’中

的变化都是‘空间’中的变化”。^⑥埃利亚斯试图以此来解决所谓的空间和时间的分裂,然而他实际的做法是赋予时间的位置关系以具体性而将空间的位置关系视为是对运动和变化过程的抽象,这就使得原本同为人为建构的分析性概念的“时间”和“空间”被赋予了不同的理论地位,从而无意中暴露了埃利亚斯思想中的历史主义偏好。而卡斯特主张“空间是结晶化的时间”的论断不过是站在空间主导的立场上重述了埃利亚斯的判断而已,其实质都是将空间视为一种同时性的状态。^⑦

至此不难看出,二元论的时空观在西方社会学的思想中造成了持久的混乱,其所引发的不必要的智识上的扭曲深刻组建了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基本内涵,它与主体和客体、意识和无意识等二元论所引发的混乱共同塑造了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基本框架。颠覆此种二元论的谬误无疑是组建一种迈向当代中国时空社会学的核心诉求之一。事实上,我们以实践为核心阐发时间与空间的本体论特征的做法已经为建构一种时空的整体性思路奠定了基础。如果时间的社会本体论地位意味着实践的可能性,而空间则意味着实践的关系性,毫无疑问,它们都只是实践的非实体性的构成因素,可能性与关系性不可能以两个彼此独立的实体的方式并存于实践之中。事实上,实践的可能性只能是有关某种实践关系的可能性,而实践的关系性也只能是有关某种实践可能的关系性,也就是说可能性是关系的可能性,关系性是可能的关系性,两者之间是共属一体的,将它们人为地拆解开来既是分析的需要也是语言的局限。由此可见,社会时空是不可割裂的整体,这不是时间和空间作为不同的双方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不可分割,而是它们不过是一个整体的不同的名称,人们常

① 参阅郑震《空间:一个社会学的概念》,《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5期。

②⑦ [美]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466、505页。

③ 参阅Lefebvre, H., *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84, p. 195. [美]索佳《后现代地理学和历史主义批判》,王志弘等译,载许纪霖主编《帝国、都市与现代性》,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28~229页。

④⑤⑥ Elias, N. *Time: An Essay*, Oxford, Cambridge: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2, p. 99、100、99~100.



常被他们自己所起的名称引入歧途。

四、时空社会学与当代中国社会

通过对当代西方社会学的时空研究的反思和批判,针对其所存在的弊病并结合对现实的观察,从而厘清并重建了时空社会学的一些基本问题,这同时也为我们理解当代中国社会提供了一些基本的理论假设。我们显然可以从时空社会的两个分析层次出发来思考当代中国社会。首先就是围绕物理时空的社会意义所形成的各种具体的时空问题,我们乐于将其称为是作为一门分支社会学的时空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它可以引导我们去关注诸如工作与闲暇的时间分配、工厂或学校中的时间表、大众消费的时空差异、居住空间的社会分化、时空的性别隐喻、公共场所的时空安排与社会秩序的建构、时空分化与权力结构的关系、公共交通系统的建设与房地产经济的发展、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的溢出效应或连带效应、产业结构调整的区域战略、全球化和地方化之间的融合与冲突等各种具体的时空问题。不难看出,作为一门分支学科的时空社会学所研究的对象遍布于当今社会的方方面面,其所产生的意义是任何一门分支社会学都无法回避的。然而作为分支社会学的时空社会学并不能够取代其他分支社会学的地位,尽管物理时空的广泛存在使其影响遍及所有社会领域,但是物理时空的社会意义却无法充分地解释所有的社会活动。例如,教室的时空安排的确可以很大程度地帮助我们认知现行教育制度对于课堂秩序的官方理解,可以帮助我们设想老师和学生可能如何凭借或运用各种时空的设置来维持课堂互动的进行,以期实现课堂教学的目标。但是它却无法为我们解释教材本身的内容设置,无法揭示学生对教学内容的具体理解以及教师对教材内容的具体发挥等。同样,学校中的时间表可以从一个方面非常明确地为我们揭示官方的教育制度是如何规范和检查学生的学习节奏和学习效果,为我们揭示教学内容是按照怎样的时空安排加于学生的学习生活等。但是我们却无法通过对时间表的研究来充分地把握学生与教学内容之间的实际互动过程,以及学生对时间表的秩序规范的实际遵守情况等。

事实上,作为分支社会学的时空社会学的局限

性恰恰表明它与时空本体论维度之间在分析上的巨大差异,尽管关于物理时空的社会学研究不可避免地奠基于时空本体论的维度,也就是说物理时空的社会意义正是来自于相应的时空本体论内涵的生产和建构,但是时空本体论的问题显然是一个统领社会学论域的基本问题,因为在一种非二元论意义上,社会学所研究的对象只能是社会实践或社会活动的可能的关系或关系的可能。如果说列斐伏尔反对用现代空间的矛盾来吸收空间中的矛盾、反对用空间的生产来取代空间中的物的生产,^①表明他并没有使其自身的空间研究充分摆脱作为分支社会的空间社会学,那么我们所讨论的时空本体论则超越了列斐伏尔所画定的界限,它试图以一种时空社会学的视角来重构社会学的研究,从而在根本上颠覆指导实证主义社会学的普遍主义和绝对主义视角。当然这丝毫也不意味着贬低作为分支社会学的时空社会学对于当代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意义,以下我们将以当代中国大型城市所广泛出现的郊区化现象为例,较为详细地揭示这一研究的基本思路,并指出其奠基于时空本体论的实质所在。

城市的郊区化往往是多种因素所导致的结果,其中较为主导的因素往往有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和原住人口的增长致使旧城空间难以吸纳新增人口的居住要求,从而导致大量人口涌向郊区;其次,大规模的旧城改造使得城市中心区的黄金地段被商业资本所拓殖,迫使大量城中居民涌向郊区较为便宜的居住空间。当然郊区化还包含了富裕阶层逃避市中心的拥挤和污染、寻找郊区优质的环境资源的动力,事实上最优质的郊区化居住空间往往被富裕阶层所占据。不过也不排除市中心的工业企业随着城市发展对环境要求的不断增高而向人烟较为稀少的郊区迁移,从而带动其周边形成一定的聚居形态;最后,还少不了交通、购物、教育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拓展,它们一方面使得市郊有可能形成一些相对独立的生活社区,从而减少由于远离市中心所带来的不便,另一方面则也为郊区市民进入主城区提供了方便。不可否认的是,郊区化显

^① Lefebvre, H.,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Malden & Oxford & Carlton: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1991, p. 334.



然不能支持一种时空的二元论,生活与生产空间向郊区的扩展显然不可能是一个静态的空间话题,郊区化本身就是一个城市发展的过程性现象,它体现了城市在面临一系列挑战的过程中所做出的过程性应对。然而这种使得社会物理时空呈现为一种整体性现象的根本在于时空本体论上的共属一体性,因为郊区化物理空间生产过程的实质并不是一些物理材料的搬运和堆积,也不是物理过程运动的分分秒秒,而是赋予它们以社会意义的可能的关系建构或关系的可能建构,后者才是郊区化时空研究的根本所在。而一旦转入了时空本体论的维度,我们将发现本体论上的时空性不仅能够为物理时空提供其社会意义的本体论支持,而且还拓展至郊区生活的所有方面,也就是说,那些原本无法用物理时空的社会意义加以有效或充分解释的郊区人群的社会实践也具有其自身的时空性。

我们可以将郊区化理解为是城市时空的一种拓展和分化的现象:一方面是城市时空向乡村的拓殖,它彻底改变了原有的城乡格局,极大地拓展了城市的地位和影响力,改变了相关农业人口的生存状态,也就是他们存在的关系性和可能性(我们不拟在此讨论失地农民的处境问题,尽管这是一个郊区化导致的重要问题);另一方面则是城市自身分化的现象,它体现为城市人口居住时空的区域化重构(不同的人群在郊区化的过程中根据自身的收入、受教育程度、职业、籍贯、年龄等特征开始分化和聚集),城市商业区、住宅区和工业区的分化,主城区和郊区的分化等等。这些现象的实质只能是社会关系的不同可能性在竞争性选择的过程中不断的现实化,它们极大地改变了当代中国人的生存状态。我们可以从如下的主要方面来理解这一问题:(1)人口从乡村向城市的聚集以及从中小城市向大城市聚集的现象,意味着移民和原住民生活状况的巨大变革,他们必须应对各种可能出现的新的社会关系形态,这些无疑是对他们原有社会关系形态的巨大冲击;(2)城市老城区的改造破坏了原住民的传统生活方式(如守望相助的街坊邻里的生活方式),迫使原住民

根据收入、受教育程度、职业、年龄等方式向郊区分化,新兴的现代化小区生活往往很大程度地割断了与传统的联系,而邻里居住格局的改变则难以在新邻居之间重建起传统的交往方式。当然这种去传统化的过程并非只是近期的现象,只不过近期的郊区化过程进一步地摧毁着传统的邻里模式,而那些大量涌入郊区的年轻人则原本就缺乏传统生活方式的熏染,这不可避免地意味着当代中国城市人的社会关系形态的变革;(3)在第二点中已经提及的阶层分化的问题值得在此专门讨论,郊区化具有典型的阶层分化的特征,人们主要根据自身的收入、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所提供的消费能力与偏好从而在居住场所的选择上分化开来,这一分化的实质是具有不同社会关系性和可能性的阶层之间的分化,它事实上导致了阶层之间在居住时空上的隔离,从而强化了社会分化的景观特征,不利于不同阶层民众之间的交往与沟通;(4)郊区化往往是城市区域功能分化的一个组成部分,郊区往往成为城市居民聚集区和工业区,而城市中心的黄金地段则被大规模的商业区所占据,这一集约化的模式在提高城市生活效率的同时,也体现了城市生活方式的转变。主城中心区往往日益成为娱乐、购物乃至各种服务行业和办公机构的中心,人们白天涌入主城中心区消费和工作,晚上则又回到相对边缘区域的住所,这种生活模式不可避免地重塑着当代中国城市居民的社会关系的可能形态;(5)郊区化无疑是城市化生产的重要构成因素之一,它已经成为推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一事实使得它对于整个当代中国社会都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其对于雕塑当代中国社会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它无疑在广泛地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时空存在,而其中所蕴含着的各种社会暴力和不平等因素则无疑成为当代中国社会之时空暴力和不平等的重要构成之一。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社会学院

责任编辑:秦开凤

